

doi: 10.3969/j.issn.1007-6522.2018.02.008

建国初期工农联盟的巩固

——以1954年春节前后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实践为例

吴奕佳, 李放春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1954年春节前后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工农之间的交往互动为主要实例,并结合1949—1954年其他地区的实践状况,可初步考察并呈现建国初期中共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途径、方式与策略。一方面,中共继承了革命年代的宝贵财富,将工农联盟实践与生产运动紧密结合;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推动工农互访与生产参观、工农联欢、工农座谈等工农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以及工农通信这一非面对面的互动,中共试图在巩固实践的过程中重塑工农对工农联盟的认识。

关键词: 工农联盟; 生产运动; 工农互动; 工农座谈; 工农通信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8)02-0097-12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工农联盟作为新中国政权建立的政治基础被载入此纲领中,并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认识上高度强调工农联盟的巩固对于国家经济与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在行动上也想方设法努力推动工

农互动,以巩固工农联盟。然而,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工农联盟经典理论的梳理与阐释,对建国初期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政治努力则疏于考察与呈现。后者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工农联盟是“十月革命”的重要经验,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①中国革命的胜利,被视为“忠实地在本国具体条件下运用了列宁的

收稿日期: 2017-12-15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06112016CDJXY470002);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IASP1607)

作者简介: 吴奕佳(1993-),女,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李放春(1974-),男,山西昔阳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共和国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列宁:《论工农联盟》,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6年版。1963年初,毛泽东会见印尼共产党第(转下页)

工农联盟学说”的成果。^[1]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于苏联提供的巩固工农联盟、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也非常重视。可以说,中共不论在工农联盟的理论论述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都深受苏联的影响,尤其在建国初期,“苏联经验”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①在工业方面,积极开展工业劳动竞赛,接受苏联技术援助;在农业方面,以苏联集体农业为榜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开展增产节约、将余粮卖给国家等活动。而落实到工农联盟问题上,中共则效仿了列宁针对“过渡时期”提出的阶级路线,并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这一时期的具体阶级政策。此阶段,中共认为“我国的工农联盟就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联盟”。^[2]

在上述背景下,1953—1956年期间,国内理论工作者写过一些关于工农联盟的小册子,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突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②这些小册子在当时关于工农联盟的讨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些小册子同时也承担着配合

特定时期政治教育宣传的工作任务。这些小册子虽各有特点,但都具有类似之处:在言语表达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说教形式,在观点上基本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对于工农联盟的经典理论论述,表现出顺应和继承中国共产党言说的单一路线,易于让人认为建国初期的工农联盟只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单方面的缺乏实践效力的政策表达。而笔者认为:工农联盟不仅仅表现在党和政府的理论论述方面,也应该表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具体的交往互动方面。基于此设想,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1949—1954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推动、组织下的工农互动情况。建国初期,工农联盟在实践中到底是怎样得到巩固的?^③通过具体地考察并全面地呈现工农之间多种形式的互动实践,本文尝试初步回答这个问题。

一、建国初期工农联盟实践状况

随着时代任务和工农情况的变化,工农联盟在不同时期中有着不同的性质。建国初期的工农联盟就是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

(接上页)二副主席约多时曾指出“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最基本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

①毛泽东说:“(新中国建立后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见毛泽东的《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18页。

②有关工农联盟思想理论论述方面的小册子包括:吴江所著的《工农联盟问题》(人民出版社,1954年)、高放所著的《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它们除了明确工农联盟中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工农联盟在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即由从前的以政治军事联盟为主、经济联盟为辅的联盟转变为以经济联盟为主的联盟。另有一些展现工农联盟实践情况的小册子,如《工农联盟小故事》(华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以及由陆象贤所著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帮助农民的》(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主要通过描绘几个具体的故事,讲述工人和农民怎样相互帮助的。

③就本文研究目的而言,笔者主要关注的不是巩固的效果如何,而是巩固的具体途径、方式与策略。

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在此过程中,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实现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在中国建成无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使个体农民逐步变成集体农民,为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富裕而斗争。^[3]此时的工农联盟既承担着部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诉求,同时也肩负着实现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在中国建成无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因此,建国初期亟待中共解决的不仅仅是工农联盟的理论发展问题,更是由工农联盟实践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过渡时期需要通过何种方式来巩固工农联盟?怎样加强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日常联系?怎样通过工农联盟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等。

与通过下发强制性条文进行贯彻实施的方式不同,建国初期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常常与各种生产运动紧密结合,以运动的方式开展。1951年,在天津举办的华北工农物资交流展览会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它打响了建国后工农展览会的第一炮。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开始筹备此会,并制订出10月初在天津实施的工作方案。经过为期80天的筹备,1951年10月5日,此次展览会在天津隆重开幕。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刘澜涛在展览会的开幕式上明确此次大会的任务是“指导工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从经济上巩固

工农联盟”。^①

此次大会设有17个展览馆,分为综合、农业、土特产、工业四部分。综合部分有物资交流馆、工商业改进馆、区际馆;农业部分有棉花馆、粮食馆、经济作物馆、战胜灾害馆、农业生产资料馆、农业生产改进馆;土特产部分有山干鲜货馆、药物馆、畜产馆、水产馆;工业部分有棉织品馆、日用品馆、手工业馆、重工业馆。最为可观的是,大会通过组织推动了全国性的城乡物资交流,从经济上加强了城乡互助,由此巩固了工农联盟。推销的产品以土产特产为主,占总值的60%以上。大会通过组织全国性的城乡物资交流,为滞销品找到销路,共销出滞销品700多亿元。如河北存了五年多的黄芩、知母等滞销药材,通过物资交流展览会被销出。大会交易中,贯彻公私兼顾、互惠互利的精神,按照各地不同的需要组织交易,首先支持了国防前卫地区东北区的购货需求。如东北贸易团从10月10日到11月10日购进总值1500亿元的日用工业品,约占同一时期内大会日用百货临时交易成交总额的56%。此会历时45天,共展出13000多种展品,观众达百万人。估计成交总值达15600多亿元,创全国各地物资交流展览会交易额的最高纪录。^②

除此次展览会外,还有1949年开始开展的工农业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开展的购棉储棉运动,1952年进一步扩大开展的华北工农物资交流展览会,以及随后以华东

①参阅《作好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的准备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7月16日第1版《提高人民购买力 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开幕》,《人民日报》1951年10月6日第1版。

②参阅《提高人民购买力 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开幕》,《人民日报》1951年10月6日第1版《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闭幕 从经济上思想上加强了城乡人民的联系 为工农业生产指出了具体的改进的方向》,《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1日第1版。

区、中南区和西南区等地为代表开展的全国性的工农城乡物资交流会等。^①这些运动以推动工农业生产发展为根本目的,并伴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即试图在加强工人和农民之间互动的基础上改善工农关系,以巩固工农联盟。另外,各地党和政府也陆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有利于加强工农了解和联系的活动,并试图将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活动日常化。例如:发动工人下乡访问农民,在农民遭受水旱灾害时用机器和技术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参观工厂,召开工人、农民的联欢会、座谈会等。总而言之,此时的工农联盟实践活动较为零散,并处在积极探索的阶段。

1954年春节前后,伴随中共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作为总路线重要内容的工农联盟也受到中央的格外重视。^②1954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在春节期间加强进行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一文,奠定了此后巩固工农实践活动开展的总基调。此文总结了此前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并决定根据新的工农状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巩固工农联盟实践活动开展的形式,同时还试图将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规范化、常规

化。随后,文章解释了利用春节假期广泛开展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活动的原因:春节期间是工农直接接触的最普遍、最频繁的时机。一方面,许多工人,特别是建筑工人,将要离开工厂回乡休假;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将要到城市、工厂看望自己的子弟。^[4]于是中共决定充分利用此时机,在1954年春节期间大规模地集中举办一系列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活动。

本文也以此为切入点,以重庆、四川、湖南等地为例,对其1954年春节前后的工农访问与参观、工农联欢、工农座谈、工农通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详细的考察,并与1949—1954年其他地区工农实践状况相结合,试图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建国初期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方式。

二、1954年春节前后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

(一) 前期的准备

1954年1月,全国总工会首次细化了此次巩固工农联盟实践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5]随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进行转载,各地方政府也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省、本市1954年春节前后组织工农实践活动的

^①1951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周恩来的讲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此文标志着购棉储棉运动的开展,加强工农联盟也成为此次运动开展的重要目的。华北、中南区和西南区的工农物资交流会内容见《华北物资交流大会将在天津举行 中南区和西南区正积极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人民日报》1952年4月18日第1版;《中南区物资交流大会总结(摘要)》,《人民日报》1952年8月15日第2版;《中南区和西南区物资交流大会闭幕》,《人民日报》1952年8月12日第2版。华东区的工农物资交流会详情见《华东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52年6月2日第2版。

^②《人民日报》在1953年11月到12月期间陆续发表《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向农民宣传总路线 实行总路线要巩固工农联盟》《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总路线》等文章,向农民团体和工人团体大力宣传工农联盟思想,并在此理论基础上推动了工农联盟在全国各地的实践。

计划。^①综合以上材料,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开展之前,中共主要进行了以下几点周密准备:

首先,对即将会面的工人和农民进行工农联盟教育,使他们明确此次联欢的政治目的。中央要求经过这一访问和联欢,使工人和农民进一步认识到: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必须互相支援,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完全符合工农利益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试图解决过去某些地方在工农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友爱的氛围,为经常性的工农联盟教育打下基础。^[5]

其次,不论是工人组织代表团下到农村访问,还是农民选派代表去工厂学习参观,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调查等方式了解对方对工农联盟的认识,有针对性地拟好宣传、访问大纲,有条件的还可以组织短期学习等。重庆市委制定的组织工农联欢的计划就明确要求各厂矿党委就本厂职工对工农联盟的认识和对附近农民关系的实际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根据存在的问题,由党委同志负责向全厂职工作一次关于工农联盟的报告,并组织一至两次的学习和讨论。^[6]在人员组成方面则由该地区干部领导负责组织,以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吸收一般职工参加,并尽可能携带电影、图片、文工团(工人业余文工团或当地专业文工团)、医生等参加。

另外,工人代表团还有严格而明确的纪律要求。全国总工会规定工人要很有纪律,

很有礼貌,衣着力求朴素,代表团本身的行动应该符合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并要以这种模范的行为来影响农民。对于那种傲慢不恭、不尊重农民以及其他足以引起农民反感的言论和行为,必须予以防止和及时纠正,事后还应予以批判。此外,对于所有春节期间返乡的工人的纪律问题,各地政府也号召工厂给予充分考虑。重庆市委提出,对于要求回乡且经过领导批准的职工,都应当适当地以地区为单位分别加以组织,并制订回乡的计划和纪律。^[6]湖南省宁乡地方国营新生钢厂有些工人对工农联盟认识不清,每到春节放假回乡,就向农民摆架子,讲排场,甚至打牌赌博,不遵守纪律,导致农民对工人的印象很不好。为此,工会在1954年春节以前专门组织职工就工农联盟问题进行了讨论,使该厂工人认识到:摆架子、不守纪律是和工人阶级谦虚、有组织、有纪律的作风不相符的,应注重工农的团结,不能造成农民对工人阶级的误解。^[7]

在1953年5至9月间,华北区的唐山、张家口等七个城市,峰峰矿区及沧县等四个专区,西南区的重庆,华东区的上海、无锡、苏州和常州,东北区的锦州、大连等地的工会组织,都先后组织了工人慰问团,深入附近农村进行慰问,取得了一定的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经验。^[5]

由此可见,相比于先前,中共对于1954年春节前后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活动给予了尤为特殊的重视。此时段工农实践活动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这项活动不再只是简单提及生产运动,而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工

^①如1954年1月27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成都市展开工农访问联欢活动》,详细描述了从1月19日到2月3日成都分批分地点展开访问、参观、联欢等活动;1954年1月22日《新湖南》刊登《长沙市正筹备春节工农联盟联欢活动》一文。

农联盟在实践中积累的具体经验为指导,并以中央颁布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形式将此次工农联盟的实践具体化、规范化,并试图逐渐将工农联盟的实践日常化。^①下文将考察中共采取了哪些具体方式与策略来巩固工农联盟。

(二) 具体实践

基于对1954年春节前后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巩固工农联盟实践活动的归纳总结,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面对面的工农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工农访问和参观、工农联欢、工农座谈等,此类实践活动一般对工人和农民团体间的空间距离有一定的要求,主要在两个距离较近的工农团体之间展开;第二类为非面对面的工农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工农通信,此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第一类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可应用于空间距离较远的工农团体之间的互动。^②下文将对两类实践活动分别进行介绍。

1. 面对面的互动

让工人和农民通过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在分享生产经验的过程中“把一些过往的偏见和纠纷当面说清楚”,是中共在改善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过程中善用的策略。^[8]在工农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近距离”的接触、切身的体会,都能给素未谋面却对对方略有耳闻的工人和农民在思想认识上带来最为直观的感受。这种工农互动的具体情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活动中:

第一,工农访问与生产参观。《重庆日报》刊发的关于某工厂组织农村宣传访问队的报道中描述了工农访问的大致情况:“宣传访问队十九人于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带了简单的行李出行,高举着横幅和彩色旗,横幅上面写着‘向增产节约粮食支援工业建设的农民兄弟致敬。’到达目的地后……四七宣传访问队在农村中开展了两天的宣传和访问活动,为农民演出了《把余粮卖给国家》和《访问苏联集体农庄记》……晚上宣传访问队分成四个组,分别到该乡的几个重点互助组,去同农民兄弟‘摆摆龙门阵’。访问队的人员介绍了工厂里的工人同志积极生产和学习总路线的情况。农民兄弟们热情地谈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9]在口头了解了工农团体各自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后,通常还会组织对工厂的生产状况、农村合作社、互助组的生产状况进行实地参观和考察。

第二,工农联欢。有条件的工厂或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还会开展工农联欢活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常常在春节期间和其他适当时机,组织军民联欢会,由军民双方在会上分别报告战争和生产的情况,相互提出要求,彼此鼓励,并分别进行适当的自我批评。此种实践活动的展开对军队的拥政爱民和农民的拥军优属,起了极大的作用。^[5]也正是在吸收和发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建国后中共将此种实践活动沿用于加强工农联系的实践中。

①纲领性文件包括1953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向农民宣传总路线 实行总路线要巩固工农联盟》,1954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强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各级党委》等。

②这一分类借鉴了社会学家彼特·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关于“社会互动”的论述,参阅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1966), pp. 43-61。

工农联欢是以一种与文艺活动相结合的晚会形式开展的。通常首先由工人和农民代表发表演讲,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表示祝贺,并分别报告自己的生产情况并相互鼓励发展生产。随后,就会展开一系列的文娱活动,如工农一同歌唱、看电影、看幻灯片、跳舞。^①各地的工人和农民,还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特长,创作各种题材和形式的作品,并在工农联欢大会上表现出来。如在重庆市三区工人和农民联欢会上,金刚坡乡农民表演了舞龙节目,重庆电影机厂工人演出了话剧。除电影、戏剧、幻灯片等外,民间戏曲(包括各种地方戏、木偶戏、皮影戏等)、曲艺、杂技及其他各种健康的文化娱乐节目都在工农联欢中上演。青年人兴致更高,积极地组建农村业余剧团。如北京鹿圈村的村剧团,之前曾经结合任务组织过临时演出,在专业文艺团体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些舞台经验后,在1954年大年初二晚上,村剧团进行了露天演出,吸引了一千多位观众,除了歌唱、快板等节目以外,还有小演唱《好姊妹》《解放桥》和评剧《妇女代表》,艺术水平都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大幅度提高。^[10]

第三,工农座谈。工农座谈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独围绕某一主题开展

专门的大型座谈会,如《新湖南》中提及的以“对工农联盟的认识”为主题展开的一系列工农座谈。^②大型的专题工农座谈会通常有明确的讨论主题,参与人员多为工农界的优秀劳动代表,如《重庆日报》报道的“工农劳动模范巩固工农联盟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共有15人,其中工业代表共8人,农业代表共7人,全是来自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工业生产小组组长、工业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组长、模范互助组组长。^[11]这些工农界的模范代表着各地对工农联盟认识的最高水平,他们承担着通过交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策和工农联盟的指导思想,来消除工农在思想认识上的误解的任务。

另一种是常见的小型工农座谈,此种座谈会通常与其他几种工农联盟实践活动配合开展,如重庆铁路局九龙坡地区党委邀请九龙、黄桷等村农民和军属30多人参观机务段、车辆段,并招待农民吃午饭,随后则开展了职工家属座谈。^[12]小型工农座谈一般没有明确的讨论主题,工人和农民以“拉家常”的方式围绕着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状况,对工农联盟的认识“有啥说啥”。

这几种工农实践的直接目的都是试图通过工人团体和农民团体之间面对面的“近距离”交流,消除工人和农民对工农联盟的一

①主要放映的电影包括故事片《丰收》《葡萄熟了的时候》,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第二辑》《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三年国庆节》《工业生产》《水利建设》《民间歌舞》,译制的苏联片《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光明照到高地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幻灯片包括《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王秀兰怎样领导互助组》《西伯利亚的一个集体农庄》《新中国的工业建设》《鞍钢》等。歌曲包括《工农联盟是一家》《爱国农民卖余粮》《工人农民一家人》《铁锤重呀心里轻》《印花布工人》等。

②《座谈工农联盟的认识——大家表示今后要互相支持、学习、共同搞好祖国建设》,《新湖南》1954年1月30日;《继续开展讨论 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贯彻总路线》,《新湖南》1954年1月31日;《座谈加强工农联盟问题——明确工人阶级在巩固工农联盟方面所负的重大责任》,《新湖南》1954年2月1日。

些“误解”。^①这些“误解”不仅在中央文件中屡屡被提及,在工农联盟实践开展过程中也经常遇到。^②

有的农民对工人存在一些“意见”和“想法”,有的农民因工人待遇好而感到不平。如农民陈锡兆说“我过去对裕湘纱厂的工人也有一点意见,认为她们工作轻,吃得好,穿得也好,拿三四十万元一个月。”农民师和兴说“过去只讲要我们郊区农民为城市服务,心里还转不过来,总认为城里人过得好,服务不服务,我们种了菜卖钱就是。”另有农民觉得当工人好,不安心务农,农民谭再云说“以前我不安心搞农业生产,只一心想进工厂当工人。”也有对农民有“想法”的工人,如人民铁道功臣裘建华说“我以前认为农民种一年田的生产价值,还抵不上工人一两个月的生产价值,就是将来农民使用的拖拉机,也要工人制造,因此认为农民对建设国家的用处不大,发展工业,他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13]²这些来自农民或工人的“看法”虽并非全无道理,但基本是以间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验认识,并且这些经验被无意识地模式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但当工人和农民齐聚一堂,共同以生产目的为引导进行交流时,面对面的互动方式所带来的真实感完全可以打破从前通过传言或者通信等方式所形成的固有认识,原有认识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而得到改变。^[14]

在此过程中,有许多工人和农民都开始自我反思,以前对工人抱有不满意的陈锡兆参观工厂后对以前的看法作了检讨:“原来工

人们工作很紧张。一上班,眼睛、手、脚,歇不得一下气,还要轮流做夜班。她们每个人每月要替国家生产出一千多万元,而工钱只拿三四十万元,实在不为多。家里人口多的生活并不好,就是有些稍微好一点的,也是她们自己劳动得来的,是完全应该的。”^[13]²

在面对面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工人团体和农民团体之间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分享彼此的“此时此地”,通过工农访问与生产参观使工人和农民了解到了对方的生产条件及状况;工农联欢使工农一同庆祝欢娱,拉近了工农之间的情感距离;工农座谈通过生产经验分享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使工农更为全面地了解到了各自的难处与问题。

2. 非面对面的实践活动

相比于工农联欢、工农座谈等面对面的活动,工农通信则是一种以信件作为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前者受时空限制的非面对面的实践活动。工农通信通常分为个人通信和团体通信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个人通信。工农个人通信主要是城市工人与自己在农村的家属、亲戚和朋友的单独通信。

首先,从成都市一零二厂的工人们写给农村亲友的信件中可以具体地看到个人通信的内容。修理车间工人罗辉锡在给他农村的哥哥的信中写道“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们厂里的工人们都在努力学习先进经验,提高技术、政治和文化水平,大家都一致表示,要努力提前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要生产更多更好的钢,让工厂制造更多的

^①从当时背景客观地看,工农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而非简单的误解,但这非本文写作重点,故不详细阐述。

^②参阅《人民日报》1953年11月9日刊登的《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3日刊登的《巩固工农联盟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保证》。

机器运到农村,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轧钢车间内班工会副主席吴绍清在给吴炳清的信中,希望他发动全乡的农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办好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吴绍清还表示,要把班上的工会工作和生产搞好,生产更多更好的钢材,巩固国防,支援农业发展。在修理车间工人唐荣富书信动员下,他父亲把三百多斤余粮全部卖给了国家。^[15]

从上述信件中可以看到,几位工人鼓励他们在农村的亲人大力发展生产,将余粮卖给国家,这是他们写信的主要目的。另值得注意的是,工农私人通信中工人和农民拥有两重身份。大部分工人和农民最初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家庭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要单位给予了他们最初的身份认同。在随后的社会劳动分工中,本是来自同一家庭的亲人各自拥有了不同的社会职业,并通过学习获得了不同的专业技术知识,占有了不同的生产资料,这也促使他们各自拥有了新的阶级身份。但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家庭身份对他们的影响仍旧是根深蒂固的。于是,部分工人和农民在不同的领域就拥有了家庭和阶级两重身份。在工农私人通信中,中共借助两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利用家庭认同加强工人和农民对工农联盟的认同,同时还加强了工农内部的阶级认同。

第二种是团体通信。工农个人通信的对象往往都是自己所熟知的个人,是一种建立在具体关系上的互动,而工农团体通信的对象则往往是素未谋面的工农团体,是一种建立在抽象关系上的互动。根据写信对象的不同,工农间的团体通信一般又分为工人团体写给农民团体的信件和农民团体写给工人团

体的信件两种类型。工人和农民团体的通信虽然也都是由团体内部成员来书写的,但有些团体成员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作为团体代表出现的,其行为方式也较为正式。

首先介绍农民团体写给工人团体的信,以重庆伍祥云生产合作社写给一零二厂唐瑞福生产小组的信为例。此信首先对该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时间和现今的发展状况做了介绍:“我们的合作社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份由互助组成立的,当时只有六家,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十一家,将来还要进一步扩大。”随后,该信件重点描述了发展合作社给当地农业所带来的“大转变”:“我们能够增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田土入股后,大家一齐劳动,秋收后按田土多少和劳动情况进行分配。”^[16]在介绍完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后,伍祥云合作社回应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心好好走苏联的集体农庄道路,坚定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并以保证大量卖余粮和制定增产计划两种主要方式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绝对支持。信件最后,伍祥云合作社对一零二厂的同志们提出自己的希望,鼓励工人们继续发展生产。

一零二厂唐瑞福小组给伍祥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回信在总结1953年的生产情况后,分享了该工厂增产的经验:“在一九五三年里,我们努力学习了苏联经验,坚决认真地执行了苏联专家建议,保证了我们的质量和产量的不断提高。在炼钢操作上我们创造了经验,这经验实际上是在苏联专家亲自帮助下,总结出来的……过去没有这个经验以前,就拿一九五二年十月份来说,质量才达到百分之七十几,就是说,炼一百炉钢,其中有二十几炉报废。现在我们小组质量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了。我们觉得这个经验是不够的,

需要虚心学习苏联经验和车间其他小组的操作经验,来提高它,充实它。”随后,对接下来的生产做出保证,并鼓励农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生产。

我们看到,工农团体通信的主要内容是工农团体对自身生产经验的分享,目的在于增进工农对彼此生产状况的了解,并在此过程中相互鼓励,一同达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工农联盟目标。虽然每一个工农团体书信来往的具体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无法忽视“苏联经验”的影响。一般来说,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将其生产得到发展的原因归于集体农业优于农民单干,并通过举出具体的实例作对比,包括产量的增加、耕作技术的发展、农田的合理分配、农作物因地制宜的合理耕作等方面,从而进一步突显集体农业的优越性;而工厂生产小组则将生产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增产节约竞赛、生产技术的创新、劳动纪律的强化,以及工人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大生产带来的高效率、大产量等优越性。不论是工业技术或是工人阶级理论都无法回避“苏联影响”。

此外,在工农团体通过信件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对自身生产目标的“保证”和对对方提出的生产“希望”这一写作模式,是此种工农实践活动的最大特色。在通信中,农民会做出增产粮食以及将余粮卖给国家的“保证”,工人则会做出提高工业产量及其质量的“保证”,并“希望”对方团体能够支持配合,“保证—希望”的写作模式能够在加强工农合作的过程中进一步达到“生产”的目的,并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竞

争与互相监督的机制。由此也体现出非面对面的互动模式相对于面对面的互动方式来说内容更加稳定,更容易被模式化的特点。一旦“保证—希望”的写作模式以及“苏联影响”的内容被肯定,它就能够作为一种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推行。

工农团体通信并不仅仅局限在两个单一的工农团体之间,一个工厂生产队会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农业合作社或互助组同时通信,通过不同工农团体之间相互交叉写信,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工农通信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工农之间的互动。如在1954年春节期间,《新华日报》展开了为期半个月的“巩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专题讨论,重庆的伍祥云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零一厂的张莉蓉工业生产队、七九一邹勤初小组以及王达安生产合作社等就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频繁的交叉式的书信交流。^①在此过程中,原本指向明确的信件还因刊登在报纸上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使每一封工农通信接收的对象及其影响的范围都得到了极大扩展。由此,此种工农通信就成为了一种工农之间的无指向性交叉通信,也进一步促进了工农通信网络的形成与扩大。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以1954年春节前后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工农之间的交往互动为实例,并结合1949—1954年其他地区工农之间的实践状况,初步考察并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途径、方式与策略。

首先,在此过程中,中央借助了建国前的

^①《新华日报》从1954年1月19日到1月31日展开了为期近半个月的《巩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工农团体通信专栏,《重庆日报》从1954年1月14日到2月16日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巩固工农联盟,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专栏,也持续报道了具有代表性的工农通信。

宝贵政治经验,将革命运动的经验运用于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在1949—1954年期间,中央开展了一系列与生产运动紧密结合的工农实践。除此之外,“苏联经验”作为当时的先进经验也指导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农关系的塑造。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央还创造性地通过推动工农之间面对面与非面对面的互动,试图在缓和工农误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工农协作发展生产的时代主题,并将工农联盟的实践规范化、常态化,以此建构起工农大众对工农联盟的新认识。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中央巩固工农联盟的努力不仅仅局限在对党和政府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宣传方面,还表现在组织和推动工农的交往互动方面。本文考察的工农互动正是一种以加强工农联系、消除工农误解、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目的,在工农之间展开的有计划、有组织并有严格纪律要求的政治互动。这一整套的工农互动主要分为工农访问与生产参观、工农联欢、工农座谈等面对面的互动和工农通信等非面对面的互动两大类。

通过开展前的精心筹备,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共同目的的引导下,工人和农民在面对面的持续的相互影响中,能够更有效地打破从前形成的对彼此的固有认识,并根据面对面的状况调整甚至重新建立新的认识。但面对面的互动方式对时间与空间有要求,并且有不稳定的特点,从而使试图将这类工农联盟实践活动规范化的难度增大。工农之间的非面对面的互动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使巩固工农联盟的实践进一步模式化,并通过建立起工农通信网络的方式使工农联盟的新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总之,建国初期的工农互动是中共在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努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

整套用来缓解工农间物质利益冲突,化解工农间思想误解,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工农大众认识的政治方案。把握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下中共在工农团体之间的实践方式与经验,无疑将有助于理解此后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共处理工人和农民关系等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参考文献:

- [1] 关锋. 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定力量——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N]. 人民日报, 1957-11-03(7).
- [2] 无作者. 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 [N]. 人民日报, 1953-11-25(1).
- [3] 高放. 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 [J]. 教学与研究, 1954(3): 16-23.
- [4] 无作者. 必须在春节期间加强进行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 [N]. 人民日报, 1954-01-11(1).
- [5] 无作者. 全国总工会关于春节期间组织工人代表团到农村进行慰问与联欢的指示 [N]. 人民日报, 1954-01-17(1).
- [6] 无作者. 市委制定组织工农联盟的计划——指示各厂矿工党委及郊区区委在春节期间集中进行一次工农联盟的教育 [N]. 重庆日报, 1954-01-20(1).
- [7] 无作者. 订好春节返乡三项纪律 [N]. 新湖南, 1954-02-02(3).
- [8] 无作者. 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总路线 [N]. 人民日报, 1953-12-12(1).
- [9] 无作者. 四九七厂组织农村宣传访问队——访问队为农民演出戏剧, 同农民交谈, 促进了工人农民间的互相了解 [N]. 重庆日报, 1954-01-23(2).
- [10] 吴方. 总路线照耀下的春节——京郊南苑鹿圈村春节活动散记 [N]. 人民日报, 1954-02-17(3).
- [11] 无作者. 工农业劳动模范巩固工农联盟座谈会 [N]. 重庆日报, 1954-02-02(2).

- [12] 无作者. 本市许多厂矿工人和乡村农民春节前后热烈举行联欢 [N]. 重庆日报, 1954-02-08(1).
- [13] 无作者. 学习国家总路线 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关于向占梅思想转变的讨论 [N]. 新湖南, 1954-02-02(2).
- [14] Peter L Berger,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1996): 43-44.
- [15] 无作者. 为巩固工农联盟贯彻总路线 一零二厂工人给农民写了数百封信 [N]. 新华日报, 1954-01-26(2).
- [16] 无作者. 巩固工农联盟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伍祥云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信给唐瑞福小组 [N]. 重庆日报, 1954-01-14(1).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in the Early PRC: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s in Chongqing, Sichuan and Hunan around the Spring Festival of 1954

WU Yi-jia, LI Fang-chu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As the basis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newly found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as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Chongqing, Sichuan and Hunan around the spring festival of 1954, supplemented by cases in other regions from 1949 to 1954, aiming at finding out the concrete channels, ways and strategies of consolidating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employed by Chinese Party of Communism (CPC)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The CPC inherited the precious wisdom drawn from the year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integrated the practice of the alliance with the production movement. More importantly, by promoting th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amo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such as mutual visits, informal get-togethers and group discussions, as well as the non-face-to-face interaction, i. 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CPC tried to enable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re-understand the allianc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onsolidating" practice.

Key words: worker-peasant alliance; production movement; interac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informal discuss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责任编辑: 魏琼)